

1 导 论

1.1 研究背景

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促成了新中国成立后的区域发展战略从均衡发展而非均衡发展的嬗变。1978年以前,国家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区域差异问题没有凸显,但是,这种区域均衡是以全国紧缺经济和贫困难为代价的,区域发展长期处于低水平均衡陷阱中难以自拔。1978年12月,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发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重要讲话,提出了一个深刻影响中国的政策主张,即在经济政策上“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这一政策主张使人们冲破了长期禁锢思想的牢笼,由此一种被称为“效率优先导向”的区域非均衡发展战略开始得到实施,其重要标志就是划定经济特区、开放沿海城市等政策的出台。让东部沿海地区先发展起来的政策给中国经济发展带来了巨大的空间,从“六五”时期开始到“七五”时期,这种非均衡发展战略使我国的综合国力得到增强,人民生活得到显著的改善。但与此同时也带来一个不容忽视的后果,就是东西部区域发展差距的不断扩大。

按照邓小平同志的设想,让东部沿海地区先发展起来,目的是要最后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1985年9月18日,他在中国

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指出：“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也正是为了带动越来越多的人富裕起来，达到共同富裕的目的。”区域发展差距的急剧扩大引起了第三代领导集体的高度重视，作为从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开始提出到 20 世纪末逐步完善的一种新战略，即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其主旨在于缩小区域发展差距。1999 年，“西部大开发战略”正式出台，标志着我国区域发展战略从“效率优先导向”向“协调发展导向”转变，从严格意义上说，目前我们仍然处于这一战略的实施阶段。不过，区域发展中出现的一些新情况，比如人们常担忧的所谓“中部塌陷”问题等，让人们开始思考在“十五”期间大力推动西部大开发以后，“十一五”“十二五”应该如何走才能使区域发展更协调的问题。新的中央领导集体在“十一五”期间果断提出“区域统筹发展”战略，形成“东部率先发展、中部崛起、东北振兴、西部大开发”的战略构想，使我国区域发展战略从“非均衡”到“区域协调”的发展思路变得清晰起来。

“效率优先—区域协调—区域统筹”展示了我国区域发展战略的清晰脉络。这一战略正是沿着邓小平同志关于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通过带动作用最后达到共同富裕目的的设想进行的制度安排。尽管区域发展的内涵十分丰富，但经济发展应该是区域发展的根本，这也是改革开放政策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原因。经济发展的基础是产业发展，从这点上说，我国区域经济差距的核心问题在于不同区域之间产业结构和产业竞争力的差距。“效率优先导向”的开放政策，使东部沿海地区在产业结构演进和产业竞争力提升上先行一步，从而拉开了东西部区域经济发展的差距，也使中国区域性不平等愈演愈烈。据调查，2000 年人均 GDP 最高的十个省级行政单位大多在东部沿海，最高的上海市的人均 GDP 为最低的贵州省的 9.65 倍。^[1]

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可以看成是对愈演愈烈的中国区域差距的一种制度矫正。这一战略从2000年正式开始实施,中央政府旨在通过转移支付,加大对西部地区的支持力度,在一系列优惠政策的引导下,吸引国内外资金、人才、技术投入,有目标、分阶段地推进西部地区人口、资源、环境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2000年10月中共十五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中,把实施西部大开发、促进地区协调发展作为一项战略任务。由于中央的高度重视和巨大投入,“十五”期间,西部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10.6%,地方财政收入年均增长15.7%,基础设施得到极大改善,2000—2005年这六年,也是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最快、发展效益最好、综合实力提高最为显著、城乡居民得到实惠最多的六年。但是,由于经济发展的惯性作用,西部地区的自我发展能力特别是技术创新能力不足,产业结构不合理,产业链条不长,影响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导致西部地区与其他地区特别是发达地区的发展差距还在扩大。2005年10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明确提出西部地区要“加快改革开放步伐”,通过“区域合作,增强自我发展能力”。

研究者们认为,经过30多年的非均衡发展,我国东西部地区产业已经形成一种梯度结构,在东部地区产业结构的高度化演进过程中,低技术梯度产业必然外移,承接东部产业转移正是西部地区通过区域合作增强自我发展能力的一条重要的路径,这一点也得到了中央和政府的认同。2006年12月,国家发改委等部门颁布了《西部大开发“十一五”规划》,在论及西部地区积极扩大对内对外开放时,第一条就要求引导东中部地区企业向西部地区实行产业转移,积极参与西部地区国有企业改组改

造、优势产业发展和特色资源加工基地建设,以实现东中西部地区的协调互动。在实践中,西部地区各级政府部门也十分重视承接东部经济发达地区的产业转移工作,努力实施招商引资优惠政策吸引东部地区企业西移。

但令人遗憾的是,地方政府的努力并没有得到令人满意的效果,目前西部地区承接东部投资和产业转移中出现了种种现象:一是企业转移与产业转移相脱离;二是项目引进与本土经济条件相脱离。这导致西部承接东部产业转移始终处于“只见项目,不见产业”的“企业转移陷阱”中,难以形成具有自我发展能力的优势产业。那么,西部地区是否能够通过承接东部地区产业转移进而培植优势产业实现增强自我发展能力的目标?如果可以,在这个过程中,政府政策的目标导向应该是什么?这些是摆在理论和实际工作部门面前必须得到解决的问题。本书以此为切入点,探讨西部地区承接东部产业转移,培植优势产业,增强自我发展能力的政策方向、目标与内容,旨在为西部地区产业结构优化和产业竞争力提升提供理论支持,同时,为西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政策的转型提供决策参考。

1.2 文献综述:产业转移与区域发展

1.2.1 产业转移的理论渊源

在经济学概念中,产业既可以用来特指农业、工业、服务业等三次产业划分,同时也可以指三次产业内部的各个不同的行业部门,通常使用“产业转移”的概念时,更多的是指后一个层面的含义。^[2]产业转移现象出现以来,学者们就试图对这一经济现象进行解释,围绕的核心问题就是:为什么会发生产业转移?换言之,产业转移的动因是什么?只有厘清上述问题,才能进一步解释产业转移的方向与方式、方法等实际层面的问题。

从历史上看,产业的形成是分工的结果。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提出了人类历史的三次社会大分工:游牧部落从其余的野蛮人群中分离出来(畜牧业从农业中分离出来);手工业和农业的分离;商人阶级的出现。生产力进步促使下的社会分工,奠定了产业发展的基础,随着分工的深化,在一个产业内部又分裂出不同的行业和部门,从而形成了复杂的产业结构体系。

分工的存在促进了交换的发展,正如马克思所说:“按照属、种、科、亚种、变种分类的有用劳动的总和,即表现了社会分工。这种分工是商品生产存在的条件,虽然不能反过来说商品生产是社会分工存在的条件。”^①自从有了商品交换以后,人们就在思考如何参与分工才能在商品交换中获得更大利益,这种思想成为产业空间布局的重要思想起源,可以说也是产业转移的思想基础。产业转移是指某一个(或一些)产业在国家或地区之间进行转移的过程。从经济学角度看,之所以会发生这种转移,就是为了获取更多的分工利益。按照龚雪的解释,产业转移可以看作是产业分工不断深化和发展的结果,是产业资源在国家或区域之间实现优化配置的过程。^[3]

古典经济学的奠基人亚当·斯密被认为是最早对“分工”展开系统论述的经济学家。在他的名著《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开篇就指出:“劳动生产力上最大的增进,以及运用劳动时所表现的更大的熟练、技巧和判断力,似乎都是分工的结果。”^②在分工思想的基础上,亚当·斯密根据不同国家的绝对技术差异,提出了著名的“绝对成本学说”:每个国家均生产并出

① [德]马克思:《资本论》,中央编译局译,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55页。

② [美]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郭大力,王亚南译,商务印书馆,1972年,第5页。

口本国劳动生产率高于另一国的具有比较优势的商品,而进口本国劳动生产率低于另一国的具有比较劣势的商品,可以获得财富的增进。因此,“如果外国能以比我们自己制造还便宜的商品供应我们,我们最好就用我们有利地使用自己的产业生产出来的物品的一部分向他们购买”。^①

大卫·李嘉图发展了亚当·斯密的理论,他在《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一书中,用葡萄牙和英国生产葡萄酒与毛呢的例子说明,“最有效和最合理的国际分工原则就是,各个国家应当只生产自己的自然条件比较有利的、成本比较低的商品,并用这种商品去与其他国家交换自己所需的其他商品”^②,从而提出相对技术差异条件下的“比较成本学说”。

进入 20 世纪后,瑞典经济学家赫克歇尔和俄林对比较成本学说进行拓展,提出著名的“要素禀赋理论”,认为由于各国资本、劳动力、自然资源等外生要素的差异,一国生产并出口较密集地使用其较富裕生产要素的产品,进口较密集地使用其稀缺生产要素的产品,能够获得贸易带来的利益。之后,刘易斯在《国际经济秩序的演变》中分析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跨国转移现象,并认为产业跨国转移的动因在于不同发展程度的国家的劳动力成本差异。与刘易斯仅关注到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不同,日本学者小岛清在研究日本 20 世纪 70 年代的经济实践的基础上,提出一国对外直接投资应当从本国(投资国)处于或即将处于比较劣势的产业(即所谓的边际产业)开始依次进行,因为在这些边际产业中,投资国与被投资国之间的技术差距小,较容易实现技术输出和产业转移,同时还可以避

① [美]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下)》,郭大力,王亚南译,商务印书馆,1972 年,第 28 页。

② 鲁友章,李宗正:《经济学说史(上)》,人民出版社,1979 年,第 292 页。

免对外直接投资对投资国优势产品出口贸易的替代,可以增加投资国相关设备制造业的出口。刘易斯和小岛清从行业或者产业这个相对宏观的角度探讨了产业转移的动因,弗农则从产品生命周期这一微观角度分析了某种产品的生产在什么样的条件下会从发达国家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弗农认为,一个产品从诞生到衰退要经历创新、成熟和标准化三个阶段,在产品发展经历的这三个不同阶段中,企业经营所依托的竞争优势有所不同,产品生命周期性的变化规律是催生产业转移的根本原因。

刘易斯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理论、小岛清的边际产业转移理论和弗农的产品生命周期产业转移理论从不同的角度探讨了引起不同国家之间产业转移的基本动因,说明了不同国家比较优势的差异性,也可以说是不同产业在特定发展阶段对所在国因素条件的不同要求,使得国家之间基于要素禀赋差异的分工合作能够带来经济利益,从而形成了国家之间产业转移的现象。在其后的很长一段时间中,要素禀赋差异造成的比较优势差异,成为区域之间产业转移动因的基础性解释。显然,这些理论的源头在于亚当·斯密的“绝对成本学说”和李嘉图的“比较成本学说”。

1.2.2 产业转移对中国区域发展的影响:国内两次学术之争

如前所述,经典的区域分工理论从要素禀赋差异形成的区域比较优势差异角度阐释了不同国家之间产业转移的基本动因。经济利益是决定区域分工的基础动力,但在现实中,区域利益不是由单因素决定的,也就是说,简单地从几个要素禀赋的差异来考察不同区域间的合理分工,忽略区域分工影响因素的复杂性,其结论的实践意义受到质疑。按照上述经典理论,不同区域按照各自的要素禀赋参与区域分工,各自均能获得好处,区域分工必然带来区域利益的增进。然而,这一结论却受到来自实

践经验的挑战:例如,据张可云的调查,中国沿海地区发展加工业与西部地区发展材料工业的分工格局,往往有利于发达地区而不利于甚至有损于落后地区,中国西部地区“双重利润”流失就是一个例证。^[4]正是这种客观存在的理论与现实的差距,导致近 20 年来围绕中国经济崛起的战略选择与区域协调发展模式选择问题,出现了两次典型的学术争论:一次是比较优势战略与逆比较优势战略之争,一次是梯度理论与反梯度理论之争。^[2]

(一) 比较优势战略与逆比较优势战略之争

严格地说,比较优势战略与逆比较优势战略的争论,并不是针对区域发展战略选择的争论,而是对一国的对外贸易战略模式选择的争论。争论的焦点是,比较优势战略和逆比较优势战略两种对外贸易战略孰优孰劣,更进一步是指“技术引进”和“自主创新”哪一个更适合于发展中国家或地区实现产业和技术结构升级的路径。

以林毅夫为代表的比较优势战略论者认为,一个国家的技术结构与水平是由该国的要素禀赋结构内生决定的,落后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根本差别是要素禀赋结构的差异。因此,对发展中国家来说,要想提高技术结构及其总水平,就必须首先提高它的要素结构水平,在自身要素禀赋结构不足以支撑自主创新的情况下,技术引进是推动产业结构和产业升级、以渐进的方式逐步缩小与发达国家的产业技术差距的最佳路径。他们认为,不顾自身的要素禀赋结构状况,坚持采用自主创新的所谓“逆比较优势战略”实质上就是“赶超战略”,不仅不能改善自身的要素结构水平,反而会由于经济效益差导致难以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企业自生能力”是林毅夫的比较优势发展战略观的一个核心思想,他认为,假如一个发展中国家政府选择优先发展与自己比较优势不相符合的产业和技术,在一个竞争市场中,优先发展部门内的企业将缺乏自生能力,为了维持缺乏自生能

力的企业的生存,政府将必须扭曲利率、汇率,并用行政手段配置资源来补贴或保护这些企业,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将被削弱,寻租行为将得以滋生,从而大大影响经济发展绩效。^①

林毅夫的比较优势发展战略观受到另外一些学者的质疑,并由此提出“逆竞争优势战略”。刘力群不同意林毅夫对“赶超战略”的看法,他认为,像中国这样的后起大国,只有实施向重工业倾斜的“赶超战略”,才能确保现代化的实现;^[5]洪银兴则强调竞争优势的重要性,认为注重质量和效益的对外贸易不能仅仅停留在现有的比较优势上,需要将比较优势转化为竞争优势。^[6]郭克莎则在批评林毅夫的比较优势战略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逆比较优势战略”的观点。他认为,林毅夫所倡导的比较优势战略是一种静态比较优势战略,如果发展中国家按照这一战略将劳动密集型产业作为主导产业大力发展,将影响其处于比较劣势的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发展,将拉大与发达国家的产业结构差距,使其处于国际贸易的不利地位。郭克莎提出了动态比较优势的概念,按照他的解释,动态比较优势是指未来某一时点上的比较优势,这一未来时点的比较优势对现时而言,只能或者仍然是比较劣势。为了形成未来时点的比较优势,必须积累高级生产要素,依靠高级生产要素来创造动态比较优势。因

① 参见林毅夫,蔡昉,李周:《对赶超战略的反思》,《战略与管理》,1994年第6期;林毅夫,蔡昉,李周:《赶超战略的再反思及可替代的比较优势战略》,《战略与管理》,1995年第3期;林毅夫,蔡昉,李周:《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林毅夫,蔡昉,李周:《比较优势与发展战略:对“东亚奇迹”的再解释》,《中国社会科学》,1999年第5期;林毅夫:《国家发展战略的选择方式和绩效检验》,《江海学刊》,2002年第4期;林毅夫,孙希芳:《经济发展的比较优势战略——兼评〈对中国外贸战略与贸易政策的评论〉》,《国际经济评论》,2003年第6期;林毅夫,李永军:《比较优势、竞争优势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讨论稿(NO. C2003002);林毅夫:《自生能力、经济发展与转型——理论与实证》,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

此,他主张对外贸易战略要适应、支持和促进工业产业结构升级的趋势,要推动中、高技术密集度产业特别是技术密集型的新兴主导产业的发展与出口,并主张在重点行业实施技术跨越战略。^① 由于这种观点的基础来源于波特的“产品差异型竞争优势”战略,因此被称为“竞争优势理论”。

这一争论还在继续,近年来,有学者试图在“比较优势战略”和“逆比较优势战略”或称为“竞争优势理论”之间寻求更为合理的折中战略。陆善勇^[7]认为,在国际贸易中,遵循比较优势原则容易落入比较优势陷阱,而遵循竞争优势原则容易陷入赶超困境,遵循综合优势原则才是最佳的国际贸易原则。所谓综合优势是指由外生比较优势(即静态比较优势)、内生分工优势(即竞争优势)和交易效率优势综合而成的优势。陆善勇运用新古典经济学分析框架进行研究后指出,由于分工具有报酬递增效应,因此,随着分工的发展,由生产率提高而产生的绝对利益会被不断创造和增进。但是,分工的发展会增加交易频率从而增加交易费用,因此,分工增加的收益与分工增加的交易费用相等,就被认为是最佳的分工水平。可见,在新古典经济学家看来,阻碍分工发展的主要障碍是交易效率,当交易效率提高或改进时,最优分工水平会随之提高,从而出现经济增长、贸易和市场结构的变化。由于内生交易效率差异的存在,一国就有可能出口有外生技术比较劣势的产品。因此,在陆善勇看来,当一国的要素禀赋比较优势、内生分工优势(竞争优势)、内生分工效率优势发生冲突时,一国是进口还是出口某产品,由该国生产该产品的外生比较优势是否超过其内生分工优势或交易效率中的

① 参见郭克莎:《对中国外贸战略与贸易政策的评论》,《国际经济评论》,2003年第5期;郭克莎:《中国工业发展战略及政策的选择》,《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1期。

优势而定,每个国家都应尽量充分利用外生、内生的生产和交易效率的综合优势,而避免出口有综合劣势的产品。

郭万山等认为,比较优势理论建立在要素禀赋结构差别的基础上,主要用来解释要素禀赋结构差别较大的国家之间的贸易现象,特别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贸易;而竞争优势理论强调要依靠高级生产要素创造并保持国家竞争优势,因此通常用来解释要素禀赋结构差别较小的国家之间的贸易现象,因此,这场争论的根源在于对中国要素禀赋结构判断存在着分歧:前者认为中国要素禀赋结构水平较低,后者倾向于高估中国的要素结构水平。他们认为,这两者均不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因为从区域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中国东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不同,要素禀赋分布具有非均衡性,如果考虑地区间要素禀赋结构的差异,比较优势理论与竞争优势理论就不会对立,“技术引进”与“技术创新”就会表现出很强的互补性。发达地区应该采用“竞争优势战略”,技术创新模式应以“自主创新”为主、“技术引进”为辅;欠发达地区应采用比较优势战略,技术创新模式应以“技术引进”为主。^[8]

(二) 梯度理论与反梯度理论之争

梯度理论的思想可以追溯到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的区域非均衡发展理论。德国经济学家杜能的农业区位论探讨的农业集约化水平的六个同心圆梯度分布、韦伯的工业区位论探讨的不同生产成本的工厂按等费用线在区域间的梯度变化、马歇尔的“区域企业聚集理论”、赫希曼关于涓滴效应和极化效应的“核心—边缘”理论、缪尔达尔的循环累积因果理论等,都刻画出不同区域之间的经济发展水平梯度的存在,并揭示出不同梯度的区域间经济互动的一般规律。受这些理论的启发,我国学者在 20 世纪 80 年代初期,开始思考中国区域差异及其对经济发展的影响问题,试图找到促进不同区域协调发展的中国式道路。

梯度理论形成于 20 世纪 80 年代。1982 年,夏禹龙、冯之浚发表《梯度理论和区域经济》一文,他们是我国最早提出“梯度”概念的学者。他们认为,由于自然条件与社会经济基础的不同,各国经济都具有不平衡发展的特征。经济发展水平与潜力呈现一定的由高到低的梯度排列。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应遵循客观经济规律,首先发展那些有潜力、经济水平较高的区域,然后再发展那些经济不发达地区。^[9]学界普遍认为,“梯度理论”的完整名称为“国内技术转移的梯度推移规律理论”,是由天津市科学学研究所的何钟秀同志在 1982 年墨西哥世界社会学大会第二十三次委员会上提交的《论国内技术的梯度转移》中提出的,该文后来发表在 1983 年 2 月 6 日的《人民日报》上,引起了较大反响。“梯度理论”的主要内容是:中国由于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实际上形成了一种技术梯度,内地和边远地区由于技术力量薄弱、资金不足、开发迟缓,处于“传统技术”水平。此外,大多数地区属于“中间技术”一般水平,也有一些地区已经具备“先进技术”和雄厚的经济力量。李常林等认为,我国的经济政策应该让一些有条件的地区首先掌握世界先进技术,然后将这些技术按梯度逐步向“中间技术”地带、“传统技术”地带转递,从而达到缩小地区差距的目标,并认为这是一条多快好省的路线。^[10]

梯度理论提出以后,得到许多学者的支持。著名经济学家刘国光认为:“沿海中心城市工业基础比较好,科技力量比较强,管理水平比较高。上海、天津、广州等沿海中心城市,不应只看重于扩大对内地产品的供应,而应着重在技术上帮助,采取各种形式,把技术和管理经验移植到内地,这是花钱少、见效快、提高经济效益的一条重要途径。”^①这与梯度理论观点近似。刘再兴也认可不同区域之间技术梯度的存在,并认为有梯度就有空间

① 李国平,赵永超:《梯度理论综述》,《人文地理》,2008 年第 1 期。

推移。生产力的空间推移要从梯度的实际情况出发,首先让有条件的高梯度地区引进并掌握先进技术,然后逐步依次向处于二级梯度、三级梯度的地区推移。按照梯度理论,我国的技术水平依东、中、西部形成梯度关系,由此李国平等提出,区域经济发展应正视沿海与内地的经济技术梯度,实行一种沿海与内地有先后、有层次、有梯度、有推移的发展战略。^[11]

但是,梯度理论的提出首先遭到来自西部的学者的反对,他们提出“反梯度理论”,质疑梯度理论的合理性,形成了一次学术思想的大碰撞。最先提出“反梯度理论”的是内蒙古自治区党委政策研究室的郭凡生,他在《新技术革命与经济不发达地区的基本对策》一文中明确提出与梯度理论不同的观点,认为现有生产力水平的梯度,不一定是引进新技术的顺序。随后,他又在《何为“反梯度理论”——兼为“反梯度理论”正名》一文中,对“反梯度理论”的基本内容进行了总结:现代科学技术的转移有三个基本走向,一是向商业和贸易比较发达的地区转移,二是向智力和生产力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转移,三是向自然资源比较丰富的地区转移。所以,若将中国作为一个开放系统看,国外先进技术向国内转移有相当一部分会采取超越(跨梯度)的方式,不经沿海的消化吸收,直接向内地和西部不发达地区转移,这是由于大多数自然资源在内地和不发达的西部。国内技术转移遵从的是效益规律,不是梯度推移规律。从实际来看,有些技术需要通过沿海吸收消化再向西部转移,有些技术则要靠近自然资源,直接为内地和西部吸收,因此,国内技术梯度转移只是国内技术转移的一种方式,将其作为规律表述并不合适。国内技术转移的效益规律构成“反梯度理论”的核心。他还强调说,“反梯度理论”承认经济技术发展不平衡的梯度,也承认国内技术按梯度推移是一种较好的方式,但不承认其是主导国内技术转移的规律。^[12]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李新男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13]

“反梯度理论”的提出得到了一些学者的呼应,如蒋海清认为,根据由于历史因素所造成的东、中、西三大地带的经济和科技梯度,是不能推导出国内技术转移顺序的规律的,国内技术“梯度理论”是片面的和不完善的。他把技术分为两类,一类是具有强烈自然资源和原燃料地指向的“指向性技术”,另一类则是不具有强烈自然资源或原燃料地指向的“非指向性技术”。对“指向性技术”转移而言,从技术先进的自然资源地或原燃料地向技术落后的同类地区直接转移,没有必要也不可能经过没有这些资源和原燃料的较发达地区中转后再转移。^[14]

王至元、曾新群在《经济研究》发表文章指出,依据统计分析,东部沿海与内地经济的发展有一定程度的差别,但不能得出“东部发达地区、中部次发达地区、西部不发达地区”的梯度分布的结论,更得不出“东部成熟型、中部成长型、西部开发型”的结论;相反,沿海和内地各自内部的差别要显著大于它们之间的差别。因此,依据东、中、西三大地带划分不能完全揭示中国工业布局复杂情况的最基本的特征,实行东、中、西部的梯度开发,只会加剧区域间发展的差距,这表明梯度战略是不可行的。^[15]

在梯度规律是否存在的问题上,形成了上述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据蒋海清的对比,发现有趣的是,持肯定观点的学者大多来自东部地区,持否定观点的学者多数来自西部,这使“梯度理论”之争包含了某种经验因素和感情因素。^[14]1999年,中央提出西部大开发战略,学者们对区域开发政策的关注热情高涨,关于“梯度与反梯度”的争论在这一战略实施过程中仍然继续着。不过,有学者试图跳出单纯“技术梯度”的角度,从更综合、更系统的视角研究中国区域发展的不平衡问题及区域开发的策略。

西安交通大学李国平教授的研究团队提出了“广义梯度理论”的概念,对区域发展差异进行了诠释。他们认为,传统梯度理论对东、中、西三大地带的划分过于粗疏,忽视了地带内部地

区间在经济总量和产业结构上的差异,忽略了各省之间及其内部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另外,主张中西部地区发展内向型经济,承接东部地区转移过来的传统工业,东部则集中精力发展高精尖产品。他们认为,梯度推移战略的不足根源于梯度理论本身,因为“梯度”的内涵是指事物在一定方向上呈有规律的递增或递减的现象,其外延极其广泛,不局限于经济水平和技术水平这种狭义的“梯度”。在此基础上,他们提出了所谓“广义梯度理论”:广义梯度是一个以自然、经济、社会、人力、生态、制度为梯度子系统,内部结构关系极其复杂的巨型系统。各子梯度系统内部及其相互之间的各种比例关系是不同的。广义梯度巨型系统中自然要素梯度、经济梯度、社会梯度、人力资源梯度、生态环境梯度、制度梯度各子系统间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形成了纵横交错、纷繁复杂的系统网络关系。^[11,16]广义梯度理论把区域经济开发看成是一个连续的动态过程,依据该理论,针对不同的发展阶段,提出相应的发展战略。一般说来,在经济发展落后或者工业化的初始阶段,宜采用增长极开发战略;在经济发展已有一定基础或者工业化的中期阶段,宜采用点轴开发战略;而在经济发展基础较好或者工业化的中后期阶段,则宜采用网络开发战略。^[17]我国的西部大开发战略要跳出平衡发展和不平衡发展战略的传统理论框架,结合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特殊文化背景,在“时空公平”的层次性可持续发展理念和广义梯度推移理论的精神实质的鼓舞下,走全方位、开放式、层次性、可持续发展的广义梯度推移战略之路。^[18]

近年来,美国管理学家迈克尔·波特提出的“产业簇群”概念引起了国内学者的高度关注,对区域企业聚落现象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产业集群”“企业集群”“企业聚落”“企业网络”等术语频频出现在专业期刊文献中。以波特“钻石模型”为基础的区域产业竞争力研究对区域发展战略进行了重新诠释,其中刘艳

关于“企业集群地域根植性”形成的区域黏性,导致沿海地区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竞争力大幅提升,并未出现向西部欠发达区域转移的规律,这对“梯度转移”理论提出了质疑和挑战。^[19]

1.2.3 对已有研究的评述及本研究的方向

区域产业转移是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纷繁复杂的产业转移现象面前,人们在思考:为什么会发生产业转移?其动因和机制是什么?什么样的转移方式更具有合理性?给出这种问题的解答,是摆在经济学者面前的任务之一。科学合理地回答这些问题,对区域间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从这个角度上说,已有研究成果作为学者努力探索的一种标志,均有着积极的社会意义。

亚当·斯密的绝对成本理论、李嘉图的比较成本理论、赫克歇尔—俄林的要素禀赋理论、刘易斯的劳动力部门转移理论、小岛清的边际产业转移理论和弗农的产品生命周期产业转移理论等,从利益获取的角度说明了不同国家之间产业转移的动力基础,符合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的逐利假设,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不同国家之间的商品贸易分工而引发的产业转移现象。换言之,这些理论为不同国家如何参与国际产业分工获取分工收益提供了理论帮助。

国内学者将上述问题的研究与中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试图找到有利于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可行道路,这体现了当代经济学家的理想与抱负,这是首先应该得到肯定的。不管是“比较优势战略和逆比较优势战略”的争论,还是“梯度理论与反梯度理论”的争论,都是围绕中国的实际情况展开,从不同的视角揭示出不同战略的合理性,尽管观点之间有差异,甚至相左,但在我们看来,仅仅是各自视角不同形成的不同意见而已。多种视角的交叉更有利于对事物做出合理的判断,所以,就发现真理而言,这种争论不仅不会影响中国区域经济的发展,反而是探寻区

域协调发展的最佳途径。

本着探求真理的精神,笔者在此谈谈对上述研究成果的理解与认识,并就区域产业转移问题发表一些看法,以此作为对已有研究成果的评述,也是作为对现有理论的一种补充。

(一) 不能忽视企业在产业转移中的主导作用

现有的区域产业转移理论是在新古典经济学分析框架下进行的,将区域要素禀赋差异看成是区域产业分工的主要依据,在利益最大化原则下,每个区域发展与自身要素禀赋相适合的产业,就能获得区域分工的好处。当区域要素条件发生改变时,区域间的产业转移就会发生,从而就能实现资源在区域空间的重新配置。但是,这仅仅回答了产业为什么会在区域间发生转移的问题,并没有说明这种转移是如何实现的。由于忽略了企业这一产业转移的载体,产业转移的实现问题自然不能得到合理的说明。

我们知道,新古典经济学秉承了古典经济学注重经济生产性的传统,将经济活动看成一个生产函数,在均衡分析框架下进行的生产决策,其核心主题是价格机制的有效性。无论是一般均衡理论还是局部均衡理论,在均衡假设的分析框架下,均将价格在供求平衡中的作用当作研究核心,以证明市场机制在配置资源中的基础性作用。在这种研究传统下,企业被抽象为一个简单的投入产出装置,一边是各种生产要素按照市场供求条件变化的投入,一边是应市场需求的产品产出,至于这个装置是如何将要素转换成产出的、装置的内部结构与产出的转换效率有何关联,则完全被忽视了。因此,在新古典经济学中,企业就像一个“黑箱”,一个追求利润最大化的黑箱。能否实现利润最大化,仅仅与市场结构有关,与企业装置本身无关。

新古典经济学的研究框架在现实中遇到了挑战,它无法回答“为什么在有精致的市场机制情况下,还会有企业存在”这一